

# 关于“文学”的概念（改订稿）

On the Concept of “Wenxue (文學)” Revised Edition

中島敏夫

NAKAJIMA Toshio

愛知大学名誉教授

*Honorary professor, Aichi University*

*E-mail: ty818844@fsinet.or.jp*

## Abstract

The word “wenxue (文學)” first appears in Chinese in Volume six “Xianjin (先進篇)” in the Analects (《論語》) of Confucius. In this volume, “wenxue (文學)” appears immediately after “morals (德行)”, “speech (言語)” and “politics (政事)”. According to the Analects, Zi You (子游) and Zi Xia (子夏) excel in “wenxue (文學)”. Here the meaning of “wenxue (文學)” implies “the learning concerning characters and documents.” However,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he word “speech (言語)” here carries the same meaning as “wenzhang (文章)”. This “wenzhang (文章)” means “bright and beautifully refined,” and unlike modern Chinese grammar, does not carry the meaning of “sentence.” In context, “wenzhang (文章)” indicates refined, beautiful words.

When Chinese characters were simplified and came to be written on paper in the later Han (漢) Dynasty, “wenzhang (文章)” came to imply “what is written”, thus gaining the meaning of “sentence” that it now carries in modern Chinese grammar. The word “wen (文)” in “wenxue (文學)” also contains in itself the meaning of “wenzhang (文章)”, that is, the meaning “sentence.” Thus the word “wenxue (文學)” contains the meaning of both “wenzhang (文章)” and “xueshu (學術)”, i.e., “learning.” Later when Xing Bing 邢昺 annotated the word “wenxue (文學)” as “wenzhang boxue (文章博學)”, he used the word “wenxue (文學)” in the sense explained above. In the late Six Dynasties (六朝), “xue (學)” (xue in the broad sense) was roughly divided into “xue (學)” (xue in the narrow sense) and “wen (文)”. “Xue (學)” contains Confucianism, various schools of thought, and the study of history. “文”(“wen”) (in the broad sense) is divided into two, that is, “wen (文)” that has rhymes (“wen 文” in the narrow sense) and “wen (文)” that has no rhymes, i.e. “bi (筆)”. This “wen (文)” in the broad sense can be regarded as a part of “xue (學)”. This “wenxue (文學)” include “wen (文)” as “xue (學)” = scholarship. “Xue (學)” consists of four elements that contain “wenxue (文學)” along with “jingxue (經學)” = “the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shixue (史學)” = “the study of history”, and “xuanxue (玄學)” = “metaphysics.” This “wenxue (文學)” is the “wen (文)” or learning of “wenzhang (文章)” and is learning distinguished from “the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the study of history,” and “metaphysics” (the study of the various schools of thought including the Tao school.)

In the second “wenxue (文學)”, “wen (文)” as “learning (學)” is included in the larger concept “learning (學)”, but at the same time in the word “wenxue (文學)” “wen (文)” and “xue (學)” exist in parallel as individual concepts. Thus “文學” is formed by combining the word “xue (學)” which expresses the “全體” (whole) i.e. the overall, larger concept, whilst “wen (文)” expresses the smaller, more specific concept or “部分” (portion) that is included in the larger concept. This particular structure is an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 of the “文學”. This structure where longer words are formed by combining a word that expresses the larger, with another word that expresses the smaller, more specific concept is a particular feature of word formation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sometimes 全體 + 部分, sometimes 部分 + 全體) Other examples of words with this particular structure include “經籍” “藝文” “言語” “巫覡” and so on.



“文学”一语，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最先出于《论语·先进》：

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围绕着这里的“文学”一语，有两种对立的见解；流传较广的是北宋邢昺（932-1003）的解释，其《论语注疏》云：

若用其言语辨<sup>1)</sup>说，以为行人使适四方，则有宰我、子贡二人。若治理政事，决断不疑，则有冉有、季路二人。若文章博学，则有子游、子夏二人也。

邢昺对“文学”的解释是“文章博学”。这种“文学”由“文章”和“博学”（即学问）两者构成的看法广泛流行，在日本也相当普及。现代的中国文学理论界，比如《中国文论大辞典》“文学”条目亦有如下记述：

文学：文化学术的总称。《论语·先进》（引用同上，略）。孔子把文学列为四门学科之一，而子游子夏是文学科中的代表，宋邢昺《论语疏》“文章博学则有子游子夏二

1) 《十三经注疏整理本·论语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160页上，校勘记云：“辨”各本并作“辩”

人”。可见在先秦时期，文学包括文章博学，文章指文学作品，博学指学术性著作。<sup>2)</sup>

中国有代表性的辞书，例如《辞源》、《中文大辞典》<sup>3)</sup>中也引用了邢昺的解释，初看上去并不存在问题。

在30年代，则有郭绍虞的论文《文笔再辨》，其中说：

我尝根据邢昺《论语疏》解“文学”为“文章博学”之说，推知周秦时“文学”一名包括文章博学二义，至汉时则分指博学为“文学”，诗赋为“文章”，于是始歧而为二，自谓此义亦前人所未发。<sup>4)</sup>

郭氏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1934）、《中国文学批评史》（1955-1979）中也阐述了同样见解，如后者说：

邢昺《论语疏》云“文章博学，则子游子夏二人”，可知所谓“文学”云者是学习古代的典籍，用来丰富他广博的知识的。这样，文学和学术是没有什么分别的。邢昺所谓“文章博学”，并不是把“文学”一科再分为二，而是说这两科在后世可分，在当时是合一的。这是孔门对于“文学”的含义，同时也是我们首先应当肯定的。<sup>5)</sup>

郭绍虞在此处明确指出“文学”一语包含“文章”和“博学”两义，邢昺所谓“文章博学”并非是“文学”由文章和博学两部分构成的，而是到汉代才两分为“文章”与“文学”的，在《论语》的时代它是“合一”的。由于郭氏地位较高，当然其影响也较大。

在中国的著作中，还存在着与此对立的另一种解释，具有代表性的是清朝刘宝楠的《论语正义》、民国程树德的《论语集释》。尤其是前者，可以说是至今《论语》研究的集大成，有关《论语》的所有见解几乎尽皆收入其中。刘宝楠认为当时的“辞命”属于孔门四科的“言语”科，他引用《孟子·公孙丑上》“宰我、子贡善为说辞，冉伯牛、闵子骞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于辞命，则不能也’。”接着刘宝楠总结说：“是言语以辞命为重。”刘宝楠接下来引用《诗经·定之方中》毛传“故建邦能命龟，田能施命，作器能铭，使能造命，升高能赋，师旅能誓，山川能说，丧纪能谏，祭祀能语”，说：“此九者，皆是辞命，亦是言语。”他还引用皇侃《论语义疏》中范宁（东晋）所说“言语，谓宾主相对之辞也”认为

2) 《中国文论大辞典》百花文艺出版社，1990年，113页。

3) 《辞源》，商务印书馆，修订版，1979年。《中文大辞典》，林尹、高明主编，台湾1973-1979年修订。

4) 《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34年，3页。

5) 《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5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新一版）1955年版，8页。

“范以当时最重邦交，故言语当指此事，亦是被举一端，以例其余”。要而言之，“言语”是孔子所说的“辞命”、孟子所说的“说辞”、《诗经》毛传的九种文体，其中“邦交”之“使”用以“造命”的“宾主相对之辞”是其代表。

顾易生、蒋凡所著《先秦两汉文学批评史》就持这一观点，该书引用了上述刘宝楠的《论语正义》后，作了以下结论：

这是说，言语指政事、外交、生活中的应对说辞、各种文书制作；文学指对《诗》、《书》、《礼》、《易》、《春秋》等文化典籍的学习、研究、传述。<sup>6)</sup>

以上介绍了围绕《论语》中“文学”这一概念的两相对立见解。“文章”究竟属于“言语”科呢，还是属于“文学”科呢？两种看法哪一种是正确的？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并提出自己的结论。

## 二

“言语”、“文学”所指何事？其焦点在于“文章”属于两者之中的哪个。要考察这个问题，四科的顺序是一个重要依据，即为什么“言语”科在第二位，“文学”科在第四位？此外还必须考察《论语》前后时期相关词语的用法。必须把“言语”和“文学”以及“言”和“文”各置于两者的关系中去理解。“言语”和“文学”概念的规定是有双关性的，一方的规定影响到他方，同时受到他方的影响。因此必须把双方的规定联系地进行考察。问题在于是否可以把“言语”理解为辩论？属于“言语”科的，辩论以外还有什么。这样，又牵涉到与“书”、“学”的关系。在文献上，可作参考的有《论语》、《左传》、《孟子》和《毛传》，还有后世对此的解释。在考察四科序列时，要涉及到各科所属的人物。总而言之，应将这些问题放到历史的长河中去把握。文学的原点确实在口头上，不在文字上。文化的重点逐渐从口头的声音向文字（书写）转移。

对于《先进》篇中“孔门四科”之一章与紧接其前的“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一章，有的书作为一体不分章（如郑玄、朱熹），有的书别建两章（如皇侃、刘宝楠）。议论关涉到是否赞同这里所举的“孔门十哲”的人选。前者的看法认为“子曰”的内容包含了此孔门四科，四科的人物论是孔子的话。曾子当然列于贤者之中，此处之所以没有他，是因为他未从行于陈蔡之地。皇侃引用了王弼的话：“此四科者，各举其才长也”，“弟子才不徒十，盖举其美者，以表业分名，其余各以所长从四科之品也”，刘宝楠赞同此说。这是比较妥当的见解。据《史记》的记载，孔子生于鲁襄公22年（公元前551），但据《穀

6) 《先秦两汉文学批评史》顾易生、蒋凡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69页。

梁传》、《公羊传》生于襄公21年（公元前552）。死于哀公16年（前479），73岁。孔子去陈蔡是63岁时的。<sup>7)</sup>

有一种看法认为《先进》篇的这段话前原本冠有“子曰”的字样，而与前一章各自独立。但是，孔子直接面对其弟子时是直呼其名而不用其字的。“孔子呼弟子，皆名。此书字，不名。亦可知非孔子语。”（程树德《论语集释》）这一看法是妥当的。这一段话并非孔子之语，“初无‘子曰’者，是记者所书，并从孔子印可而录在论中也。”（皇侃），“印可”即认可之意，是按照孔子的认可所记录的。

据《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49，这一年孔子4岁）的记载，穆叔曾说过：“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以“德”、“功”、“言”的顺序建立此三者而成为三个“不朽”。自不待言，“不朽”对人来说是为最重要的事。与孔门四科比较，应该注意到这里缺少“文学”而有“言”（“立言”），可以说“文学”尚未进入最重要的事情之中，在《论语》中它虽排在最后，但毕竟已经名列其中了。对“言”说“不朽”，尽管与孔门四科“言语”不完全相同，但不可不承认穆叔的“言”与孔门“言语”是有共通点、一脉相承的。《礼记·玉藻》云：“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汉书·艺文志》云：“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这里的“言”无疑是上述穆叔和孔门四科的“言”、“言语”的源流。而且这里发言的“言”就被记录下来，有发言人和记录人两种。发言人系列恐怕是与孔门四科的“言语”科相承，记录人系列则与孔门“文学”科相承。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8）中下面这段记载是极其重要的。

郑攻陈之后，郑将在这次战争中捕获的俘虏等等献给大国晋国。晋国却要追究郑国的责任，对此郑国的子产用巧言作了辩解。对于为何侵略小国以及对“戎服”（军装）参内的指责，子产作了难以反驳的辩论。士庄伯不能反诘，故而报告了赵文子。“文子曰：‘其辞顺。犯顺，不详’。乃受之。”于是接受了献俘。对于这件事孔子附加了见解：

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也。”

这里将“志”、“言”、“文”放在一起，“文”与“言”是相对的。可是另一方面又说“言之无文”、“文辞”（“非文辞不为功”，“文辞”意思是“文的辞”“完美的言辞”）。把“文”附加于“言”。“文”属于广泛的“言”，是“言”的一部分。同时其作用是使“言”更为充分，使“言”的内容得到出色的表现而加以切磋推敲，这就是“文”。这个“文”是与“言”相对的概念。“文”处于广义的“言”之内，同时又与“言”相对。这些词语之间

7) 《孔子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2003年，86-87页，等。

的关系，也是考察“文学”中“文”与“学”两词关系时的参考。

《周易》中有《文言传》，这是“文言之传”的意思，所谓“文言”就是“优美之言”。上述《左传》子产的话，从形式到内容均是“文”的，为了说服对方而具有充分的语言条理，那难以抗辩的“顺”就是“文”。但是《周易·文言传》的“文言”之“文”有特指形式上优美的倾向。因为《文言传》以外的传（如《系辞传》等）也有优美的内容，而《文言传》在形式上更加优美。

《论语·宪问》说：子曰：“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

这一章显示，为了替外交使节准备言辞，先由裨谌等四人制作原稿，加以讨论、修饰，最后由子产润色完成。这里当然也不排除他们利用文字原稿的可能性。

《论语》中“文章”一语出现两次，有两个意思（基本义没变）。一例见于《泰伯》：“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惟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这里称赞尧的业绩，尧的功绩作为“文章”而光照遐迩。把文化的光辉灿烂称之为“文章”。另一例见于《公冶长》：“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这是子贡就孔子自身之“言”而说的话。这里的“文章”与《左传·襄公二十四年》的记载相同，是指“优美之言”的。即是感动人心的‘美’言。这里必须注意的是“文章”之类“可得而闻也”、“不可得而闻也”，就是说是可以（或不可以）听到的。这表示“文章”是通过孔子之口（声音）述说的。“文章”一语到了汉代，虽然仍有优美之文的意思，却用以指书写之作了，尽管在《论语》中明确指“可得而闻”口头语。从《论语》到汉代，可以说有了截然不同。

《论语》之后的文献资料，有上文引用的《孟子·公孙丑上》。云：“宰我、子贡善为说辞，冉伯牛、闵子骞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孔子）于辞命，则不能也’。”赵歧（后汉）注说：“言人各有能。我（孔子）于言辞命教，则不能如二子。”接下来的会话中，公孙丑问：“昔者窃闻之：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冉牛、闵子、颜渊，则具体而微。敢问所安？”孟子答曰“宰我、子贡、有若，智足以知圣人”云云，并引用了三个人的发言。对此，朱熹集注说：“说辞，言语也。德行，得于心而见于行事者也。”（《四书集注》）后半是对“德行”和“言德行”的关系所作的说明。孟子将孔子弟子分为三组；一（德行）：冉伯牛、闵子骞。后追加颜渊，缺冉雍（仲弓）。二：宰我、子贡。后追加有若（姓有，名若）。三：子游、子夏。追加子张（姓颛孙，名师）。“政事”门阙如。对于第二组的宰我、子贡等人，孟子称其“甚为说辞”，即孔子所说“我于辞命，则不能也”。这一组擅长“说辞”、“辞命”，朱子亦云“说辞，言语也”。

接下来的资料是上文提到过的《诗经·定之方中·毛传》：

故建邦能命龟，田能施命，作器能铭，使能造命，升高能赋，师旅能誓，山川能说，丧纪能诔，祭祀能语。君子能此九者，可谓有德音，可以为大夫。（“德音”一作“德”，无“音”字）<sup>8)</sup>

重要的是后半的话：“君子能此九者，可谓有德音，可以为大夫。”这里把命龟、施命等九者的制作看作是成为大夫的条件。《毛诗正义》疏更加以详细注解，对各文体都举了具体的例子。这是极为重要的资料，但因为篇幅关系不得不作省略。不过这里不可忽略的是有作诗赋（“升高能赋”）一事<sup>9)</sup>。

汉·扬雄《法言·君子》云：

圣人固多变。子游、子夏，得其书矣。未得所以书也。宰我、子贡，得其言矣，未得所以言也。颜渊、闵子骞，得其行矣，未得所以行也。圣人之书、言、行，天也。

说属于“文学”的子游、子夏得到了“书”，可见“文学”是运用文字的一种行为。《孟子》里“说辞”“辞命”就是“言语”。孔子说这点“不如二子”。但是《法言》里这两个人的“言语”远远不及孔子，那“言”不止是“说辞”。“说辞”只是其代表而已。

后世的《论语》注释书中也有若干可供参考的资料，如三国魏·何晏《论语集解》、六朝梁·皇侃《论语义疏》。书中引用了王弼（后汉）、范宁（东晋）的注，今整理如下：

王弼：“此四科者，各举其才长也。”“弟子才不徒十，盖举其美者，以表业分明。其余则各以所长，从四科之品也。”<sup>10)</sup>

范宁：“德行，百行之美也。言语谓宾主相对之辞也。政事谓治国之改也。文学谓善先王典文。”<sup>11)</sup>

皇侃：“四科次第，立德行为首，乃为可解。而言語为次者，言语，君子枢机，为德行之急。故次德行也。而政事是人事之别。比言语为缓。故次言語也。文学指博学古文。故比三事为泰。故最后也。”<sup>12)</sup>

8) 《毛诗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236页。

9) 《汉书·艺文志》诗赋类：“凡诗赋……传曰‘不歌而颂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诗赋为五种。”

10) 《论语集解义疏》魏何晏解、梁皇侃疏（《四库全书》所收）卷六。《论语正义》刘宝楠撰，中华书局1990年版，442页也引。

11) 《论语集解义疏》魏何晏解、梁皇侃疏（《四库全书》所收）卷六。《论语正义》刘宝楠撰，中华书局1990年版，442页也引。

12) 《论语集解义疏》魏何晏解、梁皇侃疏（《四库全书》所收）卷六。

《汉书·西域传》颜师古（唐）注“‘为文学’，谓学经书之人”也可作为参考。根据上述扬雄《法言》“子游、于夏，得其书矣。未得所以书也”，范宁注“文学谓善先王典文”，皇侃注“文学，指博学古文”，以及《汉书》颜注“为文学，谓学经书之人”的注释，可知“文学”是学习“书”即用文字书写的经典，而邢昺疏对“文学”的释义则是“文章博学”。应该注意的是，皇侃的“文学，指博学古文”和邢昺的“文章博学”，初看上去似乎相似，但实际上却大不相同。皇侃的“博学古文”是说“广泛地学习古文”，而邢昺的“文章博学”则是指“文章”与“博学”两者。邢昺将“文学”之“文”看做“文章”，将“文学”之“学”看做“博学”。是前边已经看过了。

### 三

“言语”是怎样一个概念？不能将它与今天的概念作同样的理解。现在的“言语”之词，广义上一般用以指“言语学”或世界的“言语”、民族的“言语”等等。这个“言语”现在在日本也写作“言语”，在中国一般写作相反次序的“语言”。但是在先秦的《论语》时代它是怎样的概念？这一点还有必要加以讨论。此外，还有把这个“言语”解释作舌辩、雄辩的倾向，这种看法是否正确呢？

所谓“言语”首先是“言”、是“语”，必须从这一基本点出发。《说文解字》中对“言”字以及“语”、“论”、“议”、“谈”各字有以下说明：“言，直言曰言，论难曰语。”“语，论也。”“论，议也。”“议，语也。”“谈，语也。”在“言”字项下采用了“言”、“语”对应形式的说明，而“语”、“论”、“议”、“谈”则采用了互训的形式进行说明。但互训中只指出了它们的共同点，舍弃了不同点，故互训的解释作用是有限的。

检阅《论语》中“言”字的用例，不少用例表明“言”是仅次于“德”的重要事情。“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子路》），以及“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宪问》）。应注意这里的“言”是排除了“巧言”之意的。“巧言令色，鲜矣仁”（《学而》），“巧言乱德”（《卫灵公》）。与巧言相比，口讷更近似于君子，所以说“仁者其言也讷”（《里仁》）。尽管“说辞”是语言的代表，但是其代表性在《论语》中确实还有很大的局限。

“语”字在《论语》中使用14次。“和人说话”、“就某内容与人说话”、“对话”之意的用例，如《八佾》篇：“子语鲁大师乐。”《阳货》篇：“居，吾语汝。”就某题目讲话的例子，有《述而》篇：“子不语怪力乱神。”下面是“言”、“语”同时出现之例，《乡党》篇：“食不语，寝不言”（吃饭时不互相说话，睡觉时不讲话<sup>13)</sup>）。此例是两个词的最基本的用例，“语”就是互相说话、对话的言词。下一例是“被告知之语”的意思，《季氏》篇：“吾见其人也

13) 藤堂明保著《论语》，日本，学习研究社，1981年，186页。



矣，吾闻其语矣。”《诗经·定之方中·毛传》云：“‘祭祀能语’者，谓于祭祀能祝告鬼神而为言语，若荀偃祷河（《左传·襄公十八年》），蒯聩祷祖（《国语·晋语九》）之类是也。”是对神灵说话之例。而《论语》书名亦为“语”，孔子的话本身即是《论语》之“语”。关于书名的意思，《汉书·艺文志》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小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杨伯峻《论语译注》也用了这一见解<sup>14)</sup>。此外，约略同时的《国语》书名里也使用了“语”字。《国语》是各国国别的对话纪录。

如上所述，《说文解字》中互训的方法是有局限的。最终，我们还是不能不站在今天的立场讨论“言”是什么、“语”是什么。藤堂明保先生《汉和大字典》说“语”的本字是“吾”，“口+音符‘五’（=‘互’字，表示交叉）而成，表示相互说话之意。”

参考《论语》中的使用情况，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言”是“讲话”、“发言”、“所说的话”。“语”是“和人说话、就某内容与人说话、对话”，以及“（这种场合）所说的话”。与神灵的对话、向神灵所说的话也是“语”，大概朗诵之“语”亦属于此类，是原来意味着对神灵等等对话的意思吧。

总之，所谓“言语”就是上述的“言”和“语”。“言”和“语”有时在意义上是并列的两个词，同时“言”也总括指话语的全部，也包括“语”。另有一个饶有兴味的资料，后汉班固《两都赋·序》说：“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在汉代，“文章”一语包括司马相如等，（有时更进一步也包括司马迁）是指书写而成的文章。而在班固此文，他们被说成“言语之臣”，让人感到是孔门四科的延长。

#### 四

四科的顺序当然包含了评价。在顺序随着时代而变化，这反映了社会对各科评价的变化。这一点从下列表中可以看出（参考程树德《论语集释》）。表中显示“德行”第一的位置没有变化，“言语”的地位随着时代发展而降低，相反“文学”的地位提高了，最后两科的位置发生了逆转。《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政事”位于“言语”之先，刘宝楠说这是由古文经文的《论语》而来的。请看下面《春秋末—宋代孔门四科顺序表》。

不过《论语》中的“学”没有现在的“学习”之“学”和“学问”“学术”之“学”的区别。可以说，当时语言上还没有对此加以区别的意识。但是，从我们现在的观点来看，若“文学”之“学”属于“学术”，就可以觉察出“学”这个词里包含的区别。《论语·雍也》：“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论语·学而》谓：“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

14) 杨伯峻著《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二版），25页。

时代、人名	书名	四科顺序
春秋末—战国	《论语·先进》	德行、言语、政事、文学
西汉·司马迁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德行、政事、言语、文学
西汉·桓宽	《盐铁论·殊路章》	×、政事、言语、×
刘宋·刘义庆	《世说新语》篇名	德行、言语、政事、文学
唐·李贤等注	《后汉书·文苑传》注	德行、政事、文学、言语
北宋·范仲淹	《推委臣下论》	德行、政事、言语、文学
北宋·苏辙	《上范资政书》	德行、文学、政事、言语
北宋·刘歆	《论语讲义序》	德行、文学、政事、言语

有余力，则以学文。”从前一例看，所谓“学”并不仅限于学术，广义的学习也属于“学”。孔子最为看重颜回，这从颜回死时孔子“天丧予！天丧予！”的哀叹也可以想象得出。这种对颜回的评价，表明广义的“学”有很高的地位。可以说孔门四科皆属于“学”，是孔门弟子努力的目标。但是“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学”以及“文学”之“学”属于狭义“学”，只不过是广义的“学”的一部分。此时“学”之对象的“文”，大概是指经典学习中的文字、文献。这种经典之学，除了文献文字所记载的“文学”之外，还有“言（口语）”和“礼”这样的实践之学。这样理解才能明白“文学”在四科之末的理由。

孔门四科的人名及其在《论语》中的出现次数和年龄如下：

四科	《先进》称呼	姓名	次数	年龄，比孔子
× 德行	(颜渊)	颜回子渊	32	少30岁
	闵子騫	闵损子騫	6	少15岁
	冉伯牛	冉耕子牛	2	×
言语	仲弓	冉雍仲弓	11	×
	子贡	端木赐子贡	57	少31岁
政事	宰我	宰予子我	7	×
	冉有	冉求子有	17	少29岁
文学	季路	仲由子路、季路	54	少9岁
	子游	言偃子游	9	少45岁
	子夏	卜商子夏	27	少44岁

年龄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孔门四科未用姓者五人。全员以字称呼，没有以名称呼者。尽管这里最大的问题是“言语”科所处的位置，但特别重要的是对此科中宰我、子贡的评价是否得当。出现频度最高的是子贡57次。频度低的是冉伯牛，除《先进》篇外只有1次，是伯牛生病时孔子前去看望，孔子反复叹曰：“斯人也而有斯疾。”（《雍也》）孔子对于颜渊的评价最高，也明显地表现在颜渊死后孔子的感叹中。

子贡为孔门中最为丰满多彩的人物，可以说是与老师在精神上联系最为密切的人。在《论语》中出现57次。孔子死后，“弟子服三年。三年心丧毕，相诀别而去……惟子贡庐于冢上，凡六年，然后去。”（《孔子家语》）《史记》谓：“子贡利口巧辞，孔子常黜其辩。”

（《仲尼弟子列传》）然而《论语》中未见其“利口巧辞”之例。《史记·仲尼弟子列传》里有子贡前往鲁、齐、吴、越、晋，活动、游说诸侯的记载。这些记载很长，是罕见的。详细介绍了子贡舌辩的内容。那是齐国的田常发起叛乱时的事，《史记》总结道：“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在《史记》里子贡的巧辩非常出色，超过了郑国的子产。然而，使人感到究竟有多少是可信的史实？这是经过战国的激烈动荡、纵横家大显身手之后所假托出来的子贡形象。据《史记会注考证》引用，苏辙曾经评论说：“所记皆非。盖战国说客设为子贡之辞，以托于孔氏，而太史公信之耳。”清·梁玉绳《史记志疑》谓：“倾人之邦国，以存宗国，何以为孔子，纵横捭阖，不顾义理，何以为子贡，即其所言了无一实。”王安石亦曰：“子贡虽好辩，诘至于此事耶？亦所谓毁损其真者哉！”最近的韩兆琦《史记笺证》也说：“……有些地方使人无法相信，例如有关子贡的大篇幅描述，两千年来对之相信的几乎没有。因为它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合乎当时的时代风气。”<sup>15)</sup>

最终的结论是这些记载并非史实。子贡的形象，《史记》和《论语》不同了。从先秦到汉代，随着文化发展，文化重心由“言语（口语）文化”向“文字文化”转移了。子贡形象的变化也是随着言语和文字两者的比重发生逆转的一种结果，其表现就是“言语”的意思被巧辩所取代了吧。虽然《史记》中的子贡人物像无限地向雄辩家变容了，但是子贡实质上不是。《论语》中孔子对子贡的评价相当高。《论语》学而篇记载了：“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子贡）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宰我在《论语》中出现7次。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据《大戴礼记·五帝德》、《帝系篇》叙述。此《五帝德》篇是以孔子和宰我的对话形式叙述的。《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云：“宰我问五帝之德，子曰‘予非其人也。’”《论语》中宰我的形像甚为恶劣，《公冶长》曰：“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圻也。于予与何诛？’（腐烂了的木头不能雕刻，粪土似的墙壁粉刷不得。对于宰予（宰我）么，不值得责备呀<sup>16)</sup>）。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从宰我的事件以后，我改变了态度<sup>17)</sup>。’”对宰我的批评非常严厉。人们自然要问，为什么会把这样的人物提升到孔门四科的第二位呢？还有这样一件事，据《史记》和《孔子家语》记载孔子曾经为了对宰我的错误评价而表示后悔：“孔子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子羽是澹台灭明的字，《史记》里是因为他容貌之丑，《家

15) 韩兆琦《史记笺证》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3923页。

16) 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二版），45-46页。

17) 同注16。

语》里相反地是因为容貌之美，孔子评价错了。《史记》结尾还记述了：“宰我为临淄大夫，与田常做乱，以夷其族，孔子耻之。”《史记》最终否定了宰我的人格和雄辩。据此孔子对于宰我的评价，后来孔子后悔而改变了他的评价。那么《先进》篇孔门言语科的评价可能是改变前的评价或者孔门门人以前的评价。

子夏在《论语》中出现27次。据《史记》记载，子夏在孔子73岁去世那年是28岁。虽然年轻，但从《论语》中关于子夏的记述来看，他与孔子的对话还是有份量的。例如：“子夏问：‘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商始可与言诗已矣。’”（《论语》八佾篇）。《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有“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其子死，（子夏）哭之失明”的记载，儒林列传中有“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是时独魏文侯好学。”的记述。《汉书》艺文志曰：“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陆玑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曰：“孔子删诗，授卜商（子夏），商为之序，以授鲁人曾仲，……荀卿（荀子）授鲁国毛亨，毛亨作训诂传，以授赵国毛萁”。关于《春秋》之传《公羊传》徐彦的《公羊疏》及何休的注曰：“子夏传公羊高”，关于《谷梁传》，应绍的《风俗通》曰：“子夏传谷梁赤，一传而为荀卿，荀卿传申公”。关于《论语》本身，郑玄说：“《论语》仲弓、子夏等所撰定。”（《论语释文》所引）特别是《礼记》中的《乐记》篇与魏文侯的对话“魏文侯问于子夏”云云也是其中的一例。（《礼记》有29个“子夏”的用例）司马贞《索隐》云：“子夏文学著于四科，序《诗》传《易》。又孔子以《春秋》属商（子夏）。又传《礼》，著在《礼志》。而此史空记《论语》小事，亦其疏也。”这些都表明了子夏在经学上的作用是如何重要的。如果从子夏在关于“文学”即文字文献的传承上所起的作用来看，先进篇孔门四科对子夏的评价是很准确的。但是孔子还认为子夏聪明不如子张。《论语》先进篇：“子贡问：‘师（子张）与商（子夏）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

关于子游，在《论语》中出现9次。《史记》仲尼列传主要引用《论语》阳货篇记述了：“言偃，吴人，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岁。子游既已受业，为武城宰。孔子过，闻弦歌之声。孔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曰：‘昔者偃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孔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的记载，并加上了“孔子以为子游习于文学”一句，与先进篇孔门四科的评价结合在一起。

在《论语》里的“文”的用例中确实有指文字的用法或者很有可能含有文字的意思，其用例如下：

- ①.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八佾篇）
- ②. 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有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卫灵公篇）

- ③. 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雍也篇）
- ④.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篇）
- ⑤.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篇）
- ⑥. 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子罕篇）
- ⑦. 子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颜渊篇）
- ⑧. 子曰：“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述而篇）
- ⑨. 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颜渊篇）

这里的①“文献”并不是现代的文献的意思。“文献”中的“文”指的是现代语的文献，即书写的文辞。“献”是贤人的言辞，指的是没有书写的贤人的口头语言。

综上所述，有充分的证据可能表明“文学”的“文”包含文字文献的“文”。

从《论语》先进篇孔门四科的文章中不能看出“文学”科和“言语”科的内涵。不过如果从《论语》中孔子所说的“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里仁篇），“子曰：‘刚毅、木讷，近仁’”（子路篇）等来看，孔子的想法确实是从言语科的内涵中排除了雄辩。如上所见（《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古人有三不朽。“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孔门四科第二位的言语才相当于立言。言语放在第二科的理由正在此。言语科理解为雄辩，是错误的。<sup>补注</sup>言语科本来是指包括“文章”在内的优美的言辞。“文章”属于第二位的言语科，不属于第四位的文学科。总是以上的内容综合起来看，与其说《论语》孔门四科里的“文学”在《论语》里“文章”“博学”是一体，到汉代分成了“文章”“博学”，不如说是“言语”相当于“文章”，“文学”相当于用文字书写的文献构成的“博学”（经学·学术）。

## 五

“书”（文字、书写）的历史，在战国末到秦汉是一个转折时期，原因是作为载体的纸的出现和字体的改良，与简策、帛书时代相比是方便得多了。秦始皇以小篆统一文字也是一个大事件。根据最近的考古学发现，湖北省睡虎地古墓为战国末—秦代的墓葬，出土竹简中最古的是战国末期的隶书文献。而西安灞桥出土的包裹铜镜的纸片，是西汉武帝时期的文物。东汉蔡伦完成了纸的发明。“书”的技术上的这种进步，逐步改变了文化中“书”的比重，同时也改变了文化自身，学问也发生了变化。在先秦时代“书”是一部分学的支撑，到了汉

代由“书”（文字）构成的学成为学的主流。在《论语》中，“文章”就是“言”“言语”，但是到了汉代“文章”则变成了书写之物。有趣的是在汉代已经不明白“章”的原义。《说文》说：“乐竟为一章。从音从十。十，数之终也。”但是按照现在甲骨文研究，“章”字形是文身的工具，包含针和蓄墨汁部分的形象<sup>18)</sup>。这样，上古时有区别发言人和记录人两种的情况，汉代才开始了两者统一的时代。书写的方便化为它提供了条件，也给个人的文学艺术创作和欣赏打开了道路。

参考迄今为止的研究，可以概括地把“文学”概念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而最初的第一个阶段又可以更进一步分成两个时期，总体上就成为三个阶段四个时期。第一个阶段内两个时期中“文学”的概念没有变化，但是如上所述文化里的比重发生了由“言”到“文字”的转变，因此将其分成了两个时期。这里分为三个阶段论述。分期是对历史流变整体趋势的一种观察、一个基准。

【第一阶段（前期）】：先秦。“文学”是用文字文献之学<sup>19)</sup>。

“文学”与“言语”相对，“文学”是学的一部分。“文章”相当于美的“言语”。

【第一阶段（后期）】：汉代。“文学”是用文字文献之学。

“文学”与“文章”相对，“文学”是改成了学术的主要部分，“文章”改成了用文字书写的文章。此阶段后期的资料如下：

《史记·孝武本纪》：元年，汉兴已六十余岁矣，天下又安，荐绅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度也。而上乡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

《史记·儒林列传》：及今上（武帝）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

《史记·太史公自序》：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

《汉书·公孙弘传赞》：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儿宽……文章则司马迁、相如。……孝宣承统……刘向、王褒以文章显。

《三国志·刘劭传》：时诏书博求众贤，夏侯惠荐刘劭曰：“……性实之士服其（刘劭的）平和良正。清静之士慕其玄虚退让，文学之士嘉其推步详密。法理之士……意思之士……。文章之士爱其著论属辞。制度之士……策谋之士……。”

18) 藤堂明保《汉和大辞典》‘章’字项，日本，学习研究社，1978年，953页。藤堂明保《汉字语源辞典》日本，学灯社，1965年，345页。白川静《字统》‘章’字项，日本，平凡社，1984年，443页。

19) 这里的“文献”一语即现在的文献，《论语》中的“文献”与此不同，“文”为现代的文献，“献”为“贤者之言”（非文字的）。

认为《三国志·刘劭传》也如同汉代那样。《三国志·刘劭传》有“文学”和“文章”两个词并列的。“文学之士”是“嘉其推步详密”，“文章之士”是“爱其著论属辞”。

**【第二阶段】：三国～六朝**

“文学” = 汉代的“文学” (=学) + 汉代的“文章” (=文)。

最典型的例子见于《世说新语》，撰者刘义庆，六朝宋人403-444。该书将人物逸事分为36类，36类的开头4类就是孔门四科的德行、言语、政事、文学，顺序也同《论语》一样。其第4《文学》篇共收录104例，这104例分为两类，1-65是关于“学”的记事，66-104是关于“文”（文章）的记事。这些记事并非“有关文学的人物”记事，而是人物有关“文学”的记事。同一人物的记事出现在多类之中，可知不是根据人物分类的，是根据记事本身的内容分类的。其“文学”类有前半和后半，分别为“学”和“文”。“学”在前边，“文”在后边一事是有象征性的。其他资料如下：

曹丕《典论》〈论文〉：“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

《三国志》文帝纪：“初，帝好文学，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

《三国志·王粲传》：“始，文帝为五官将，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学。”

这些都是以“文章”为“文学”的较早的例子。如上所述，可知“文章”是在“文学”之内的。《世说新语》之外，《梁书》《陈书》里也有许多这样的例子。《梁书》《陈书》虽然成书于唐代，但它是梁陈时代的用例为背景写成的。“文”和“学”一体化，构成了“文学”。

《梁书·文学传序》：“今缀到沆等（‘到沆’人名）文兼学者，至太清中人，为文学传云。”

《陈书，文学传序》：“今缀杜之伟等学既兼文，备于此篇云尔。”

《三国志·文帝纪》和《三国志·王粲传》的“文学”一语才开始和现代“文学”一语有共通之处。“文章”有“学”和“文”的两面，是指作为“学”之“文章”。

**【第三阶段】：六朝后半（宋梁以降）：**

“文学”是“四学”（“儒学、玄学、史学、文学”）之一 = 作为“学”的“文章”  
此阶段的资料如下：

《宋书·隐逸·雷次宗传》：元嘉十五年，征次宗至京师，开馆于鸡笼山。聚徒教授，置生百余人。会稽朱膺之、颍川庾蔚之并以儒学，总监诸生。时国子学未立，上留心艺术，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凡四学并建。”

“文”，在梁·萧绎《金楼子·立言》篇中属于“学”。古之“文”分为今之“文”和“笔”，都属于“学”，如下。

《金楼子·立言》：古人之学者，有二（指儒、文）；今人之学者，有四（指儒、学、笔、文）。

夫子门徒，转相师受，通圣人之经者，谓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长卿之徒，止于辞赋，则谓之“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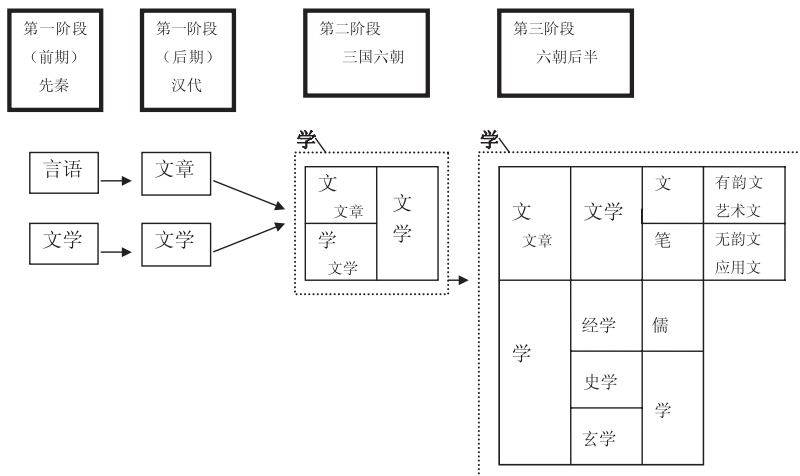
今之“儒”，博穷子史，但能识其事，不能通其理者，谓之“学”。至如不便为诗，如閻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

《文心雕龙·总术》：“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音笔也，有韵者文也。……别目两名，自近代耳。”

指出“文”在“近代”（指近于六朝刘宋的“近代”）分成“文”、“笔”。

第二阶段的“文学”当指“文章”时（比如上述《三国志·王粲传》“文学”），表面上和第三阶段“文学”没有什么区别。但是第三阶段的狭义“文学”排除了“儒学”“史学”“玄学”三学，是和三学对立的“学”。第二阶段的“文学”包括“文”（文章）和“学”（学

【“文学”概念变迁图】





术)两种,并没有排除「非文章之“学”」,是广义的。单独地说“文学”时,表面上没有区别,但是第三阶段当时的社会确实有此狭义的“文学”概念,形成了此语的模糊性。以上内容如【“文学”概念变迁图】所示。

这一时期的主要著述中关于“文学”、“文章”的用例数如下:

“文学”“文章”用例数

文献名	文学	文章	文献名	文学	文章
《左传》	—	2	《淮南子》	1	10
《论语》	1	2	《史记》	42	9
《孟子》	—	—	《论衡》	1	16
《庄子》	—	3	《汉书》	85	24
《荀子》	6	14	《三国志》	21	16
《韩非子》	16	3	《文心雕龙》	4	24
《吕氏春秋》	2	3	《文选》	17	21

## 六

语言语词的意义中,当新的意义产生之后一般来说旧的意义并不灭亡,而是与新的意义共存,这就是语词的共时多义性发生的原因。上文的分析只表示新意义的产生,并不意味着旧意义的灭亡。汉以后历代官职中有“文学”一职,此官职地位很低,职分不过是管理文书的下级书记职。这个“文学”大概包含旧的概念。

语言在一般的使用情况下,并不要求对语词的意义划分严密的界线,某些场合的模糊性是允许的。所谓模糊性,是指语词在实际应用时处于两个意义之间的某个位置(“义位”),语词的“义位”不一定很确切,说话的人自己在使用时也没有意识到明确的意义区别、“义位”,这种情况是允许的。但是必须将其和语词严密的的两义性区别开来,而且这种模糊性所具有的包容力成为前后语义发生转变时的过渡中介。

“文学”一语从先秦、汉代的学术之义经过六期前半的过渡期到六朗后半,其义转变为指与其相对的“文章”意。“文笔”之“文”也原指有韵之文,经过“诗笔”一语的中介,到了中唐以后“诗文”之“文”一变而为无韵之文。是完全反转颠倒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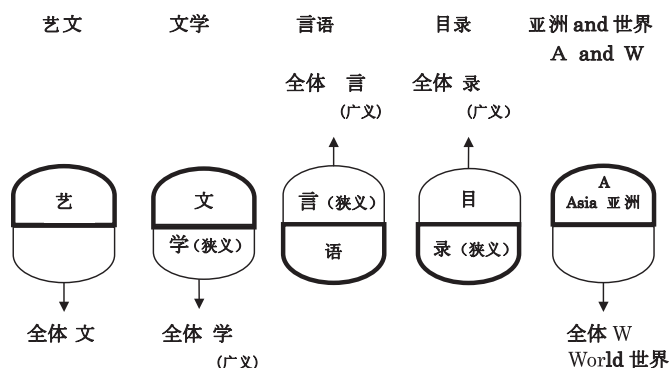
从先秦时期的《论语》到汉代,“文学”是指由文献、文字所记载的学术。“文学”一语中的“文”是文字、文献之义的“文”。由这“文”构成的“学”即是“文学”的概念。但是后来的变化如上文所示,在汉代“文学”之“文”从文字之义向文章之义转变,其范围扩大了。由于汉字书写的迅速普及,反而失去了故意地说明“本之于文字”的理由。在接下来的第二阶段结束时,“文学”之“文”就完全没有“文字”意义而变成“文章”之义了。

邢昺将“文学”解释为“文章博学”,正是针对第二阶段的“文学”的。邢昺虽然是后

来的北宋时代的人，但处于其延长线上。从北宋当时的观点看，其注释自然也立足于北宋人所持的概念。但应该说其注释仍然同《论语》的概念有不合之处。

“文学”概念的第二阶段即三国六朝时期，“文学”的内容如《世说新语·文学》所示的那样，是由“文”与“学”构成的。那么是否可以由此而将“文学”的概念理解为“文与学”呢，概念可以分为内涵与外延。尽管这个“文”与“学”至少可以看做是概念的外延，但是是否可以同时理解为概念的内涵（即意义）则还有问题。我的结论是，“文学”一语的概念，其外延是“文”与“学”，但是“文学”一语的内涵作为整体是指“学”。“文”是“学”的一部分，“学”是包括“文”在内的“学”。同时，另一方面“学”与[“学”之内所包括的“文”]形成了并列的结构，与“文”并列的“学”可能是狭义的。请参照【概念的结构】图。

【概念的结构】图



汉语中有“艺文”“经籍”“目录”“言语”“国家”“辞令”“书论”“族长”以及“巫觐”等这样的复合结构的词语。此“族长”不是‘宗族之长’的意思，而是以‘长’为代表的‘宗族’的意思。“族”（全体）和“长”（部分）并列。《荀子》乐记篇云：“乡里族长之中，长少同听之，则莫不和顺。”下面以“艺文”为例考察一下这些词语的结构。“艺文”即《汉书·艺文志》的“艺文”。“艺”指六艺。“文”在这里是指六艺、诸子、诗赋等所有六部之文。这个词的结构，“艺”是“文”的范畴之一部分，而且这部分“艺”是六部其他部分的代表。“艺”和“文”并不是像“山川”“天地”之类一般的并列结构的词那样具有同等的资格并列。可是这个词里的“艺”和“文”虽然不是同等的，但的确是并列的关系。这个词具有“文”和“艺”这一结构的同时，意义上也具有“文和艺”的意思。在这个由并列关系构成的词语中“文”包括了“艺”。因此形成了非常复杂的结构。“艺文”这个词的意义（内涵）从整体上说是指“文”。所谓“从整体上”，意思是如图所示，指包括“艺”在内的“文”之整体概念。总之，“艺文”这个词实质上的意思是指“包括‘艺’在内的‘文’”。

“经籍”“目录”也是这样。而“巫觐”“言语”则相反，其形式是前面的字作为整体包容了后面的字。但从另外的角度看，“目录”“巫觐”和“言语”则与“艺文”“经籍”不同，

其包容全体的字有两义(广义、狭义)。来新夏《古典目录学浅说》说:“目录是目和录的合称。目是指篇名或书名,录是对目的说明和编次,它可以作为包括目在内的简称。”<sup>20)</sup>“巫觐”的“巫”原来是女巫,“觐”是男巫。但是“巫”可以为男女总称。“言语”的“言”一语是当然广义的,包括作为“言”的“语”。此“言”一语的狭义情况有点模糊,但只据《说文》“言,直言曰言,论难曰语”的定义,则也有狭义并列的。“目录”“巫觐”和“言语”这些词虽然和“经籍”、“艺文”一个字包容了另一个字这个情况是共通的,但前者(“目录”“巫觐”“言语”)是同时内里又具有同等狭义并列关系的词语。这就更大大地增加了它的复杂性。“经籍”“艺文”这两个词可以说是具有典型性的。“文学”这个词和“艺文”“经籍”不同,而是像“目录”“巫觐”“言语”那样包含有二义(广义、狭义)。也就是说“学”字有狭义、广义两个意义。这个词,内部有狭义的并列关系,同时作为整体有广义的“学”包括了“文”。在狭义的层次上是由“文”和“学(狭义)”两者构成,这两者也就是概念的外延。我认为可以这样理解。

日本放送协会NHK的电视广播节目里很博得好评的“アジア&ワールド”节目即“Asia and World”(亚洲和世界)节目。这个“亚洲和世界”节目名的词语结构是完全如同“艺文”一样。“亚洲”被包括在“世界”里。虽然好像只举“世界”就够了,但亚洲有特别的重要性,不像世界其他的地区。因此亚洲是和世界并列特举的。我在这里想把这样的结构姑且命名为“Asia and World”(亚洲和世界)结构,简单地说“A and W”结构。这个“A and W”结构有时前后倒转,即“W and A”。此“A and W”结构(包括“W and A”在内),可以说是【全体+部分】或【部分+全体】的并列结构。这个结构在汉语里是比较普遍存在的。

《金楼子·立言》说:“古人之学者,有二。今人之学者,有四。”“古人之二学”指“儒”和“文”。“今人之四学”是指:“儒”分为“儒”和“学”(狭义的“学”),以及“文”分为“文”(狭义的“文”)和“笔”。这表示古之二者与今之四者都是“学”(广义的“学”)。两种“文”(广义、狭义)也是被看作“学”(广义)的。如上所述,“文学”一语的概念作为整体是“学”,这样的认识未必没有道理吧。

本论文曾在1998年5月由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所主办的汉学国际会议上发表过。其后被收录在《文化的馈赠(汉学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集)语言文学卷》。但是,被收录论文中的图表出现得混乱错误较大,难以得到读者对本文论点得清楚理解。此次,承蒙冯天瑜先生推荐,纠正了误处,并对本文若干处加笔,向本学会(中国语文学学会)提交。想向冯天瑜先生表明感谢。

(元論文故王建译。中島2006.12改訂補。2007.11再補,王贺英、中島译)

20) 来新夏《古典目录学浅说》中华书局1981年,1页。

本論文は元々『日本中國學會創立五十周年記念論文集』汲古書院1998発行に掲載した『『文學』の概念について——《論語》の「文學」をめぐって』を基礎にして、上記したように1998年北京大學百周年記念学会《漢学研究国際会議》で発表したものをさらに改訂し、2006年12月末に《中国語義学学会》（武漢）で発表したものだが、今回、日本における紹介として愛知大學国際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学会紀要『文明21』に掲載させて頂いた。その際にも更に加筆を行った。

補注：

《春秋左傳注疏》襄公24年“立德、立功、立言”孔穎達疏云：“立言，謂言得其要，理足可傳，記傳稱‘史逸有言’，《論語》稱‘周任有言’，及此‘臧文仲既沒，其言存立於世。’皆其身既沒，其言尚存。故服、杜皆以史逸、周任、臧文仲當之，言如此之類，乃是立言也。老、莊、荀、孟、管、晏、楊、墨、孫、吳之徒，制作子書，屈原、宋玉、賈誼、楊雄、馬遷、班固以後，撰集史傳及制作文章，使後世學習，皆是立言者也。”